

19420

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

Т. И. 奥伊泽尔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2 7740 9

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

哲学史论丛

[苏] T. И. 奥伊泽尔曼 著

娄自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Т. И. ОИЗЕРМАН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чер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79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 1979 年俄文版译出

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

哲学史论丛

〔苏〕Т. И. 奥伊泽尔曼 著

娄自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其书号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99,000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700 册

书号: 2188·17 定价: 1.4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奥伊泽尔曼是苏联哲学博士、教授、通讯院士。1938年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哲学系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哲学方面的教学、研究、编辑工作。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西欧哲学，以及探讨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

本书分析了哲学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探讨了哲学在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并通过对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分析，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唯心主义的批判继承关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哲学史过程之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结，革命的、批判的总结。作者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富于启发意义的见解与论证。例如，黑格尔哲学的社会意义问题，在国内外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以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黑格尔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哲学家之一。本书作者以一篇专论阐述了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为了论证自己的意见，作者触及一系列问题，不仅提出一些新的论据，而且对某些被广泛运用的论据作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引出不同的论断，这对于推动有关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哲学史进行了最详尽的研究，第一次提出了哲学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思想。但是，他的哲学史观点是以对全部历史过程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且存在着辩证方法和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矛盾：在他的哲学史中，发展的原则只应用于过去，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体系则被看作终极真理。只

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才是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在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些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他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笔记》、《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详细占有这方面的丰富材料，对哲学发展过程、哲学思潮的演变进行深入的探讨，给予科学的说明，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个重大课题。

译者限于水平，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谨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导论	1
一、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13
哲学史是哲学知识的发展	13
关于哲学史过程的现代多元论观点批判	34
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观	55
哲学与日常意识	72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	91
康德和十七世纪的哲学唯理论	91
康德关于“自在之物”和本体的学说	105
费希特的辩证唯心主义	122
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理性威力的学说	149
黑格尔哲学的社会意义	172
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关于实践的普遍性的观点	189
列宁论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一致的观点	209
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心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意识(代结束语)	227
参考书目	244

导 论

本书的内容——哲学史论丛，首先是论述哲学史这门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不仅是方法论问题，而且是世界观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使命，是要阐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包括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在内的以往哲学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发展问题的提法，首先要求区分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因此，我们力求突出与辩证唯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关的一系列极其重要、但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辩证唯心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酝酿过程中所具有的卓越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经常予以强调的。

本论丛可以看作是对我们所发表的《科学哲学史问题》（1969年）和《主要哲学流派》（1971年）两部学术性专题著作的补充。因此，我们集中力量研究这两部著作所不曾系统阐述过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对上述著作有过系统分析的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有意识地置而不论，其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一方面通过某些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辩证唯心主义问题的研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史过程的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的原则意义，而全面地探讨这一理论是颇为迫切的任务。它的意义远远地越出了单纯的哲学史研究的范围。

恩格斯强调，理论思维的历史，尤其是科学的历史命运，与哲学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他所指出的，否定作为“科学的科学”而与专门科学相对立的哲学，是与批判地掌握哲学遗产分不

开的,因为“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1^①,第20卷,第14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55页)。

理论思维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概念的性质,它是通过有关概念的学术资料的完善化,通过创立新的概念和范畴而发展的。理论思维所运用的概念,具有质的多样性。有的概念归纳了由抽象思维区分出来的为特定类别的物所固有的可感知的特点。有的概念是只有理论研究才能确定其存在的过程和关系的概括。有的概念则仅有启发意义,即它所表达的乃是认识主体所完成的操作,而不是客观实在本身所固有的事物属性或普遍性形式。例如,数学中无限小的概念就是如此。这种启发性的,即起操作性作用的概念的更为明显的例子,是逻辑学中的同一的抽象。上述几种概念远未将概念的类型学分类概括无遗。然而,这也就足以清楚地说明理论思维的概念性质,说明它与哲学的历史发展、与这一研究领域本质上所固有的概念创造之间的必然联系。

理论思维不是把概念当作某种既有的、现成的东西而简单地加以运用。概念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得到加工的:划分和联系,限制和丰富,联结成为一定的体系,纳入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外推,概括和发展,等等。然而,认识者的理论思维活动并不到此为止。探索性的研究,由于它能发现新的现象、规律性、认识的客体,所以还要求范畴的创造,不仅如此,还要求创立新的(在一定研究领域的范围内)范畴体系。

^① 指参考书目的编号,下同。——译者

所有这些关于概念发展——知识发展的历史过程之必然的逻辑表现——的见解，这里只作必要的阐述，以便理解哲学史在许多世纪来理论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也从未将认识的发展与概念思维能力本身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康德断言，判断力（把经验材料归入最一般的概念、范畴）是天赋才能，因此任何教育，任何学识也不能补充这种为研究人员所如此必需的能力。康德的这一信念是与源于他的体系的对科学史特别是哲学史意义的估计不足完全合拍的。但是，如果从康德的批判主义观点出发，有可能了解认识史的启发意义的话，那么康德想必会得出结论说：不仅判断力，而且“创造性想象力”（他特别强调创造性想象力在认识中的作用）也只有通过系统地、批判地掌握科学思想史才能得到自觉的发展。

恩格斯并不否认有天赋智力，但是他不同于康德，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是研究文化史，其中包括合理地、经过科学论证地掌握求知的思维史，特别是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史的成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学习哲学史，即了解哲学发展的经验，是理论思维的真正学校。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第20卷，第366页；译文见《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页）。当然，必须考虑到，恩格斯是在理论自然科学尚未得到发展的时代发表上述论点的。所以恩格斯才作了保留：“直到现在还没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问世以来的一个世纪，在这一认识领域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哲学和一般理论思维的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

恩格斯把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细胞和细胞形成的发现、能量转换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为形成理论自然科学的历史过程中的革命性转折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的自然科

学论据。与此相联系，恩格斯表述了唯物主义哲学创造性发展的规律性：“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第21卷，第286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本世纪初，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对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变革所引起的物理学方法论危机作了最深刻的哲学分析。这一危机直接起因于极其重大的、具有突出的世界观意义的理论发现。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列宁在发挥恩格斯关于哲学史的启发性作用的上述论点时，也强调了自然科学史的启发性意义：“……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但巧妙地运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3，第29卷，第236页；译文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0—291页）。

不言而喻，承认自然科学史具有杰出的启发性意义，丝毫也没有贬低哲学史作为理论思维的学校的意义。相反，在一部分学者中仍然屡见不鲜的对科学史的估计不足，必然与轻视哲学史的态度分不开。同时，其姓名与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相联系的那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通常总是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的和哲学的理论思维史。在这方面，A.爱因斯坦、W.海森堡、B.И.维尔纳茨基、K.A.季米里亚捷夫的著作特别典型。

科学（以及哲学）史，正如任何历史过程一样，可以用两种根本不同却彼此又有内在联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就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历史方法的任务是再现过程，包括它的一切一般的、特殊的以及个别的、不可重复的特点。以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的全部总和为基础的逻辑方法，有另一个目的：在研究所规定的一定历史范围内，揭示该现象总和的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可见，这里所谈的乃是发展过程的逻辑再现。这种研究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

《资本论》。

恩格斯指出，逻辑方法“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第13卷，第497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我们认为，既然哲学史的研究被解释为理论思维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这种研究就不应当是单纯的历史经验的研究，而首先应当是逻辑-理论性的研究、概括的理论研究、认识论的研究。这里所讲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掌握哲学在二千五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哲学（以及科学）史的这种理论总结，乃是认识论这门哲学学科的专门任务，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就是认识的发展——在其最一般的、由基本哲学范畴所规定的形式中的发展。

列宁的《哲学笔记》拟定了在对各门科学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史、技术史、语言史等等）和整个认识史作理论性的理解、概括的基础上进行基本的认识论研究的纲领。同时，列宁提到首位的任务，是总结哲学史过程，以便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参阅3，第29卷，第314页）。列宁的这一指示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而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同以往的全部哲学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形成的特点，而且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课题、内容和发展的特点。因此，下述情况当然并非偶然：列宁在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的摘要时，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哲学原理，而不了解这些原理便不可能全面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阶段的内容。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恩格斯在涉及唯心主义的两千多年历

史时，要以如下方式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1，第20卷，第513页；译文见《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

每一种哲学学说都这样或那样地与以往的哲学发展联系着。要理解某一哲学体系，不学习全部哲学史，不批判地掌握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观点、假说以及各种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终究会表明为妄问题）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这里是整体与部分的特殊的二律背反：认识部分以知道整体为前提；可是没有对部分的认识，关于整体的知识又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辩证的二律背反是可以解决的，因为认识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认识整体，对整体的知同时也提供了对其组成部分的一定的理解。

可见，如果认为通向真理的历史道路（我们不妨说得更明确，哲学史道路）之所以有意义，仅仅由于真理尚未获致，而在真理获致之后就可以把通向真理的道路置诸脑后，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真理是知识发展的过程，这些或那些真理的获致才使认识运动所遵循的道路的认识论意义得以显示出来。

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强烈的论战性。每一个哲学论点都不仅是明确的肯定，而且也是明确的否定——既是正题，也是反题。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论证，同时就意味着对唯心主义观点的否定。要正确理解辩证方法，理解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点的感觉论论点，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持之有据地否定，即科学地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不可知论、先验论、主观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见解等等，那是不可思议的。科学的哲学批判归根结底具有肯定的性质。这时，谬误被看作认识论现象，

对它的科学理解不能归结为确认谬误这一事实，而是要求研究这一谬误的暂时的历史必然性，研究它的认识论根源，因而也就是要研究哲学谬误所包含的那种实在的、与真理相关联的内容。只要对哲学研究采取这样的态度——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必要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探索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区别，便在颇大程度上泯灭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这一真理的明证。

在某种程度上，批判的性质取决于批判的对象。本书涉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对古典哲学遗产、首先是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态度。对后者的批判，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乃是对它所包含的深刻洞见的创造性加工。辩证唯物主义的积极的否定，其意义就在于此；列宁是这样谈到这种否定的：“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徒然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3，第29卷，第207页；译文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4页）。

总之，对哲学遗产的态度是每一种哲学学说的本质特点。因为它（学说）的为一定历史状况所引起的问题，在理论上是与以往哲学发展中的问题有联系的；它对以往哲学发展中的问题重新进行研究，以新的方式加以表述，使之丰富起来，“简言之，加以发展。每一种哲学学说与以往哲学发展的统一都是矛盾的统一。每一种哲学学说除了历史继承关系以外，还包含着反对那些曾经是它的理论来源的学说的斗争。例如，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同时也是笛卡儿主义的二元论、心身平行论、意志自由观、自然神论以及其他基本思想的坚决反对者。

上述统一的相对性也是它的一个本质特点。这总是以某种方式定向的统一，它由于自己的社会倾向性和哲学倾向性而是一种区别对待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要求作哲学上的选择，即对前辈采取有所取舍的态度，按照特定学说的原则选取思想。例如，斯宾诺莎不同于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倾向于哲学史上的泛神论和唯理论传统，而对哲学经验主义和经验自然科学的意义则显然估计不足。

由于内容的特点和社会倾向性，各种哲学学说批判地掌握以往哲学发展的成果的能力也就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同意黑格尔的想法，他认为，在时间上最晚出现的哲学体系由于是以往哲学发展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22，第99页）。如果遵循这一论断的逻辑，那么在培根和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洛克和霍布斯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贝克莱和休谟，就在其学说中综合了这些思想家的原则，并创立了更为丰富、更为发展的哲学体系。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黑格尔本人在考察贝克莱和休谟的学说时，对于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以其全部研究说明了，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远未批判地吸收以往哲学发展的全部成就。贝克莱和休谟的体系原则上排除了这种吸收的可能性；他们的哲学方向、历史选择、对以往哲学学说的态度显然带有片面的性质。

黑格尔的错误与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有关。他的绝对唯心主义认为，哲学史过程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这是在“绝对理念”——黑格尔把它描写为真实的哲学思维——的轨道上展开的超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超历史的领域，真实的历史发展为逻辑推演和概念（大写的）的自我发展所偷换，每一个新阶段都必然包含以往的各逻辑阶段，并使之从属于新的、更为丰富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黑格尔决未忽视的实在的哲学史过程，是在时间

上,在彼此有质的区别的历史时代的范围内进展的。这里,在相继出现的哲学体系之间,已经不存在那种片面的直接的关系了;对此,黑格尔完全承认,并且给予了系统的说明。

对实际的哲学史过程的理论认识表明,很大一部分杰出的哲学家缺乏对他们的前辈学说的积极评价,虽然他们是这些前辈的继承者(通常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甚至黑格尔,虽然他不同于其他哲学体系的创立者,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以往哲学发展的总结,可是他也未能正确评价唯物主义哲学、感觉论的认识论、自然科学的以及一般非哲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对近代哲学思想的全部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往往被说成是与以前一切哲学学说的根本决裂。

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遗产的关系的这种评价,仅仅指出了这一复杂的、矛盾的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即对旧意义上的哲学的否定。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上不同于一切其他(包括进步的)哲学学说。然而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比起其他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在无可比拟的更大程度上批判地掌握、创造性地消化和发展了以往全部哲学发展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所完成的革命的准确表现,正是对以往哲学的这样一种没有任何宗派主义狭隘性的态度,这是革命的、批判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党性的态度,科学的客观态度。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并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心主义比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参阅3,第29卷,第248页)。这部哲学史论文集,特别是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为分析对象的那些论文,是直接阐明这一高度重要的论点的,这一论点使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史、真正的哲学史科学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论基础。

大家知道,科学的理论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富有成果的

提法,是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康德的学说,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即理论自然科学)的存在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因为在这些科学知识领域里存在着具有无限普遍性的真实的必然判断。康德认为,认识论的任务在于回答这样的问题: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被康德看作他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入门的一个更重要的课题,即《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作为如下问题提出的:作为一定的智力活动的形而上学(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吗?从非科学的哲学研究向真正的哲学科学过渡的条件和途径如何?

不难理解,康德提出而未能给予科学的哲学解答的问题,与作为科学的哲学史有直接关系。作为科学的哲学史怎样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哲学史科学的哲学前提是什么?例如,怀疑论者就不同意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的提法是不同的:作为一般科学的哲学史是可能的吗?显然,问题的这种提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存在着大量相互排斥的哲学学说,而其中的每一种学说都对哲学史过程提出自己的解释——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或现象论的解释。例如,柏格森学说的拥护者是从柏格森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哲学史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一切哲学学说的评价:非理性主义的直觉唯心主义成了它们的价值尺度。新实证主义哲学史家最推崇的,自然是哲学经验主义(特别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等等的代表人物。

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的哲学史研究,论证了并且实现了对哲学学说及其相互关系等的原则上不同的态度,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当然,从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观点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史过程的研究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否定对这一过程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反对折衷主义,后者往往自诩为“客观”地考虑一切观点,自诩为综合性的世界观等等。然而,这种“片面性”实际上是对哲学史过程的彻底科学的态度,它当然要求毫不

妥协地摈弃对哲学史过程的非科学的解释。自认为超然于“极端”之上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责备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却是哲学史研究中的科学的彻底性的必然表现。勃列日涅夫指出：“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和妥协的余地”（4，第533页）。

辩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党性态度，正如前面所着重指出的，不仅不会妨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作用作科学的评价，而且是这种评价的原则性的方法论基础。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是很典型的。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彻底揭露唯心主义思辨的同时指出，他们的世界观是“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1，第2卷，第139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切真正的成就都给予唯物主义的加工和批判地吸收。正因为如此，采纳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乃是对哲学史探索的主导趋向的有科学根据的选择。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近代哲学声称它以创立这样的世界观为其使命——只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实现。这一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发展的事实所证实，而且为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史所证实。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同时也根本否定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这一观念。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的也包括在内）哲学学说来说，以往哲学发展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不是（也不可能是）发展着的体系，决不会在哲学的形成、发展中考察哲学。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哲学的过去是僵化的：它或者完全属于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代，或者又相反，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天才的创造。在这两种情况下，哲学的过去都被排除于多方面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外。

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的发展理论本身就是发展着的哲学